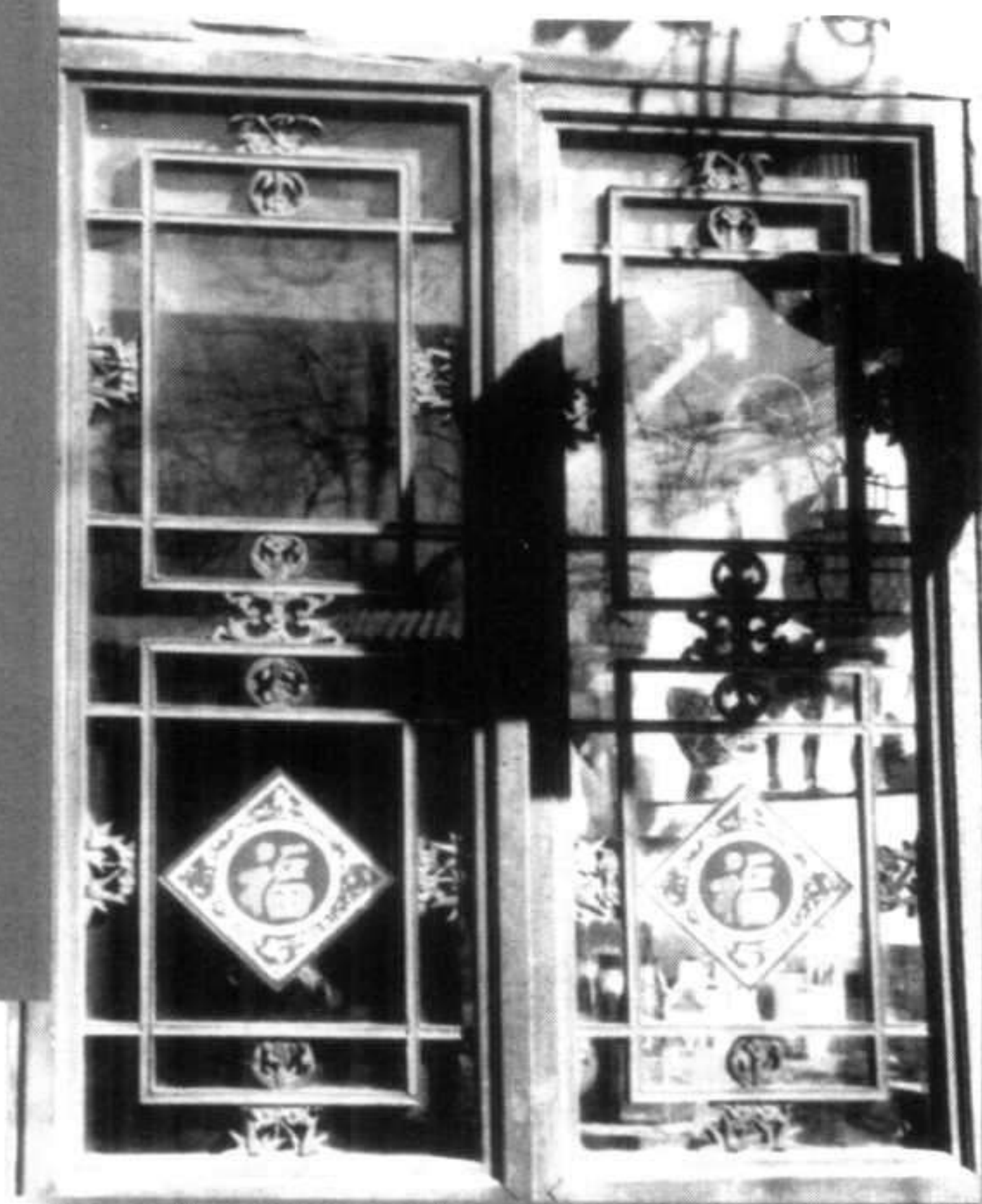


北京杂文选粹



杨子才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杂文选粹
萤窗琐语
杨子才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 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开本 47.75印张 955000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4546-2/I·723
定价：全套100元（共十本）

序

徐惟诚

这一组杂文集都是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的个人作品专集。

为了推进杂文事业，北京市杂文学会曾经陆续编辑过几本会员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时期中众人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展示某一阶段北京杂文的水平，也是北京杂文前进脚步的记录。而且，佳作荟萃，亦颇有可观。如今，会员日增，各有不同的风格，为适应杂文爱好者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会员的作品专集是有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个开头。这次先出了十本，我们希望这件事还能继续办下去。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如雨后春笋。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产生急剧变化。无数种新观念异彩纷呈。美与丑的界限变得那么模糊、不确定。包装与实质的背离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经有过“多歧路”的哀叹，今日人生的各种机遇、挑战与陷阱更在过去年代的若干数量级以上。在这样的年代，是更加需要杂文的，更加需要那种简短、明快、一针见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无情地撕破各种精巧的伪装来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旧纹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一句话，更加需要杂文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认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当然，也需要杂文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艺术享受。这就向杂文和杂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杂文能与时代同步，更加繁荣，希望有更多受到读者欢迎的杂文作者涌现。当然也希望北京市杂文学会的会员作品专集能继续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萤窗琐语

析 “ 忧道不忧贫 ”	1
司马光、马从一和苏轼	4
历史罪人莫跪拜	7
挺起铮铮铁骨	10
“ 金笼头 ” 琐议	13
孔夫子 “ 放债 ”	15
说 尺 度	18
小过莫废良才	20
兼听则明	23
“ 凉二 ” 心态	25
闲话皇帝治病	28
李斯书碑的湮没与再现	30
山乡故事	32
“ 九龙治水 ” 新篇	34
既吃熊掌又得鱼	37
岁末话吃喝	40
铁面与糟团	42
吃 “ 唐僧肉 ” 琐议	44
张公吃酒李公醉	46
烈士乎？酒徒乎？	49
“ 公脸 ” 与 “ 私脸 ”	51

我 貌 虽 瘦 天 下 必 肥	53
说 螾 蜥	55
“ 花 粉 钱 ” 及 其 他	57
“ 贪 泉 ” “ 廉 石 ” 断 想	59
腐 败 者 身 边 四 种 人	62
治 穷 邑 如 养 瘦 牛	65
崇 尚 俭 仆	68
兴 法 治 伏 “ 五 虎 ”	70
花 拳 绣 腿 说 三 事	73
说 “ 冷 胀 ”	76
“ 照 镜 子 ” 种 种	79
答 钱 神 问	82
钱 染 的 风 采	84
莫 将 “ 阿 兄 ” 当 阿 父	87
“ 三 百 青 铜 ” 的 妙 用	90
高 力 士 铸 钟	92
奇 贪 之 人 多 奇 祸	95
一 身 独 暖 亦 何 情	98
说 “ 舔 ”	100
封 建 阴 魂 不 可 招	103
马 嵬 坡 走 笔	106
出 名 新 秘 诀	109
“ 知 名 度 ” 三 章	111

《山海经》检遍无寻处	114
大观园近事	117
相轻与互捧	119
人世岂可浪得名	122
眼泪的奥妙	124
“衣锦还乡”是薄俗	127
恋“十”现象	130
人生之三境界	132
劝君莫做“麒麟楮”	135
旧事新侃	138
“梦诗”及其他	141

析“忧道不忧贫”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两个著名的修身口号：“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大概“谋道不谋食”无人能做到，因而流传不那么广；而“忧道不忧贫”，却被孔孟之徒时时挂在嘴上。应该说，作为激励个人“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像颜回那样“一簞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像陶潜那样“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一生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这个口号发生过积极作用，无可非议。

然而，一些孔门弟子们，往往把“修身，齐家，治国”混为一谈。他们弄不清“忧道不忧贫”，用以修身则身立，用以治国则国衰的道理，因而他们一旦“学而优则仕”，为官理政，则只关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这类纲常伦理，而不太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管生产是“小人之事”。这样理政，必然导致民不聊生，“盗贼多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贫困，动乱频仍。

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来辩证地看待“忧道”与“忧贫”的关系。昔日我们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建立社会主义，乃是求人民解放，谋国家振兴之道，也是求根治贫穷，谋国家发展之道。四项基本原则之道，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但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我们藉以立国求强之本。我们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建设，不断增强自身力量不独是谋求迅速解放生产力之道，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之方。但曾几何时，

儒家之徒的这种为政之道，也传染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小部分人。本来，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夺取政权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依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有的人走着走着，视线就模糊起来，而把“忧道不忧贫”奉为圭臬。“文革”中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将这种思想推向极端的表现。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也仍然有人“忧道不忧贫”，用群众的话说，就是“不怕一无所有，就怕性质不纯”。你说要引进西方某种先进技术设备，他会因为这种技术设备上面刻着某个亿万富翁的名儿，而认为这种技术设备有姓“资”之嫌，迟迟不愿首肯；你说要采用西方某些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他会认为这种经验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总结的，“鸭子孵不出小鸡”，任你磨破嘴皮，也不愿采用；你说西方的某种经营方式，如股份制一类，我们也可以试一试，他更会认为它八成姓“资”，而断然判定应该拒绝；你说多办经济开发区可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他会认为这和旧租界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宁可质疑，不愿表赞同。这种态度，与“文革”中有人所奉行的“两类矛盾性质不清，先按敌我矛盾处理”的老谱，如出一辙。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左”只是方法问题，右才是立场问题，他宁可犯方法错误，也不犯立场错误。这种认识，妨碍着我们解放思想，不利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快步前进。

旧时代一些孔孟之徒用“忧道不忧贫”治国为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害苦了老百姓。今天，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历史教训，不再处事偏颇。在社会主义时代把“忧道不忧贫”绝对化，坐而论道，困守绝境，拒绝变革，坐以待毙，乃是“左”的表现。须知，右会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左”也会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加剧，会使天下动乱，生灵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宗旨，既要“忧道”，又

要“忧贫”，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中国就大有希望！

1992年4月11日

司马光、马从一和苏轼

北宋新旧党争，用人惟派，造成了许多闹剧和悲剧。本文标题中名不见经传的马从一之所以挟在两个历史名人之间，就因为他是一场闹剧的“重点整治对象”。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在绍圣、元符年间，有个叫马从一的人，担任“监南京排岸司”的职务。漕使（负责转运的大员，新党人物）来视察，他随众迎谒。漕使一见他就怒不可遏，斥责说：“听说你不称职，早想整治，你不快滚，还敢来见我！”马从一诚惶诚恐，陈述自己是湖南人，为养亲糊口当差，哀求不已。漕使听他的口音是南方人，与旧党首领司马光（山西人）不会是同宗，便缓了口气问：“湖南也有姓司马的吗？”回禀说：“在下姓马。”漕使听了面露笑容说：“那你就努力任职去吧！”原来，漕使大人看他的名刺上写着“监南京排岸司马从一”，误以为他名叫“司马从一”，便判定他与司马光同宗，决心整治。自此以后，马从一再见上官，名刺上便省略掉那个倒霉的“司”字，写成“监南京排岸马从一”。尽管把衙门都改了名儿，也顾不得那么多，免遭横祸要紧。

时光流逝了近千年，想不到这种“认派不认人”，不分青红皂白大搞株连之举，在“文革”中竟再次重演，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其为害之惨烈，人们或目睹，或身受，勿庸赘述。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有的地方，“文革”遗风及其变种仍在作祟。笔者就听到过这样的事例，在某单位，某人当了领导，就重用“文革”中与自己观点相同、“并肩战斗”过的人，

而与他不同观点、曾经舌战过的人就遭排斥，尽管他们当初是为了互争“最最革命”的“左派”头衔，混战过一场。在另一单位，“文革”中的不同组织虽已抛弃前嫌，但一些“能谈到一块”——臭气相投与哥儿们义气兼而有之的人，又“重新组合”，继续弹奏着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的老谱。这两者表现形态不一，却异曲同工，干的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

派性与株连，是封建意识形态下的一对“双生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史中明明白白这样写着。既然“其心必异”乃古之明训，于是乎“党同伐异”，要将其“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并要“除恶务尽”，错办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株连由是而产生。株连一被“发明”，悲剧就再也演不完。譬如说苏轼吧，由于北宋新旧党争，株连不已，他便“左右不是人”。王安石当政前，他察于时弊，提出“丰财”、“强兵”、“择吏”是“存亡之所从出”，主张改革。王安石变法，大刀阔斧，他却对青苗等法持异议，与王分歧，于是被目为旧党，放于州郡。变法失败，他又“独立不倚”，认为新法“不可尽废”，应当“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与司马光发生激烈争论，为此被守旧派视为异己，施之以造谣中伤，使他难以立足。司马光死后，新旧两派的斗争变为封建宗派的倾轧，变了质的新派再次上台，继续把他视为仇寇，他连遭贬逐，到死为止。就这样，这个在史家看来“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俊，政事之精明”都超越群伦，宋仁宗、宋神宗父子一个期之以宰相之任，一个称之为“天下奇才”的旷代英杰，便不能为世所容，抱恨以终。

神州大地，物华天宝，英才辈出，灿若群星。只有抛却陈腐观念的枷锁，埋葬派性与株连这类封建意识的产物，打开眼界，拿出唐太宗李世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气魄，对人才比世间任何珍宝都更为爱惜，不拘一格用人，结成浩浩荡荡的四化建

设大军，中华腾飞方能尽快成为现实。

奉劝至今仍受派性及株连等“文革”遗风影响的人们，自己唱一唱“招魂曲”，驱赶北宋那位漕使的幽灵，使天良复苏，早些改弦易辙，回归正道。

1988年2月16日

历史罪人莫跪拜

报载：有人对慈禧当年挪用海军军费十之六七修建颐和园大发翻案议论说：“这银子要是拿去买了军舰，早就跟北洋水师一起泡汤了。幸亏少买了几艘军舰，今天才有这么多人买票来看颐和园。”

社会上的各种时髦形形色色，替历史罪人翻案可算其中一色。这些年，有人替袁世凯评功摆好，有人替溥仪涂脂抹粉，有人把李莲英写得老实憨厚充满人情味。今天有人为慈禧翻案，只不过是这时髦潮流中的又一个浊浪。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历史的健忘与无知，新站出来的“翻案英雄”比其前辈更为“青出于蓝”，更加令人吃惊。

中国历史上帝后数目上千，慈禧最为奢侈。她“垂帘听政”后期，国家积贫积弱，民生凋敝。有这样一首民谣：

寅年要吃卯年粮，光打精来精打光。
东手接来西手去，一双空手见阎王。

它说明广大农村已经破产。可是，慈禧仍大肆搜刮以供挥霍。她每顿要有成百道菜，摆得满满一大长桌，耗去数百两银子。“皇家一餐饭，草民十年粮”，并非虚语。她后期常住颐和园，史料明文记载，每日须花费白银1万两。而每次为她做寿，更是极度铺张，城市处处张灯结彩，大比奢丽。当时的名士辜鸿铭就斥责说：

天子万年，百姓出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慈禧的奢靡，比修建颐和园耗银约计3千万两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把生前吸吮民脂民膏得来的无数珍宝装入棺材。清代一位名臣写的《爱月轩笔记》，以目击者的口吻描述“大敛”情景，写了几十页纸，其大要是：她棺材内有大小珍珠21744粒，宝石1425块，另有一颗鸡蛋大的珠宝，为外国进贡之物，估价2千万两白银；她身下铺着金丝珠宝锦褥和绣佛串珠褥；她身穿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身戴朝珠三挂（其中一挂全为红宝石）；身上盖着制价64万两的陀罗经被，头顶制价285万两的翠荷叶，足登碧玺莲花；身旁放有金佛、玉佛、玉罗汉128尊，玉马8匹；足旁放置翡翠制成的西瓜、甜菜、白菜、莲藕等制价3325万两的稀世之珍。全部入棺之物制价超过7千万两（最低值）。宣统元年（1909）中外收藏家及珠宝商重新估价，价值增涨10倍；1936年再估，增值百倍。当时有人计算，这些宝物若用来偿还国债，把全部外债还清尚有余裕。

对这样一个专务聚敛挥霍，闹到国弱民穷的罪魁，还为她唱赞歌，若不是对历史的健忘或无知，又能是什么呢？

慈禧又是一个不顾民族尊严，在历史上以丧权辱国著称的人。清末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缔结的《马关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都是奉她的“圣谕”签订的。她有个臭名昭著的宗旨：“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大片的疆土，无尽的宝藏，上亿两用于赔款的白银，都在她的手上被“赠”之于侵略者。她这种近似卖国的言论与行径，曾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慨。在她70岁做寿之时，就有人写过这样一副充满血泪悲愤与辛辣讽刺的对联：

今日幸颐和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

血全枯，只为一入歌有庆

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富朝鲜。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圣寿祝无疆

对这样一个对中华民族负有千古罪责的人，还为她翻案，若不是对历史的健忘或无知，又能是什么呢？

中国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关天培的国度，绝非某种藏污垢之所。历代爱国志士血荐轩辕，前仆后继，使华夏神州充满浩然正气。这浩然正气乃国脉之所系，绝不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亵渎。“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为历史罪人翻案，不管其花样如何翻新，都只能是徒劳！

1996年8月

挺起铮铮铁骨

年老蜗居，极少逛街。一次偶进一大商场，得见衣、裤、帽、袜等日常商品，并非专为出口而生产，商标却全是洋文，一个中国字也没有。再走数家小店，又见“国产洋货”频频出现，什么香片茶产于英伦三岛，牛肉面来自美国加州。临街一些店铺，明明开在中国，却是歌舞厅名标“巴黎”，游乐场唤做“罗马”……

“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此种与学习外国之长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何以产生？窃以为，除了一些人是在弄商业噱头，以为这样一来便会“日进斗金”之外，它似乎又与盲目崇洋的心态有关。

年龄较大的人都知道，解放前住在外国租界里的一些西崽，崇洋心态就很严重。在他们眼里，自己处处不如人：黄皮肤不如白皮肤，黑眼睛不如蓝眼睛，低鼻梁不如高鼻梁，中国的海不如外国的蓝，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圆，外国人的痛疽也艳似桃李、美若红杏。

认为生我养我的国度“处处不如人”者，患的是软骨病。此类患者现代有，古代也有。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就记载了一个叫李邴的典型。宋钦宗靖康年间，官居给事（供皇帝差遣之官）的李邴出使金国，回来便说，金国“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上山”、“入水”两句，是说金人山地与水上作战都厉害）。人们鄙夷他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言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六如给